

曾经唱起那首歌

胶片时代的红色电影传奇(续3)

文 赵军

“美国大片什么时候都能看,今天晚上的党员之夜,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讲党性、也讲艺术的长篇剧情大片。”我强调了是剧情大片,接着说:“这是一部罕见的反腐败电影。上海电影制片厂新鲜出炉,已经引起了强烈轰动。我的评价是它很多真诚,很少虚伪,今天很需要这样维护社会,维护人间正气,维护党的信念的好电影。”

我稍稍介绍了剧情,表示放映完后会和愿意留下来的青年朋友们交流——我相信这才是应该有的“党员之夜”,相信大家不会惋惜和后悔。“有反对的吗?”我的目光和手中的麦克风一起扫过全场。麦克风再扫过全场。所有人就那样定定看着我。

没有反对。“换片!”我对着观众席后面的放映室,挥了挥手中的麦克风。黄臻平早就等候在机房,一部闻所未闻的国产片,居然在放映前两分钟换下了美国大片。

这部《生死抉择》长度162分钟,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夜晚,在广东省用这样的方式放出了公映的第一场,在座全部党员干部都看完了它,而且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的掌声。

我知道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和影片创作集体为这部影片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事实上,《生死抉择》之后二十二年了,再也没有过这么震撼的反腐题材大电影。

人的一生能够把握住的机会不会太多。要对得起国家人民,对得起历史和良知,也对得起电影和事业——电影人就要敢于做开“顶风船”的角色。也许在中国电影发行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敢在美国大片就要上映之际,用一部并未知名的国产电影将之瞬间当场换下。

回到家我翻开日记本整理起脑海中激荡的思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直接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去信,推荐介绍《生死抉择》。于是我连夜动笔,在信中阐述了这部影片发行的意义,强调这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反腐影片,作为一个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基层干部,同时也是一位有着位卑未敢忘忧国情怀的电影人,不能不用发行的机会努力向党向社会推荐这样一部从捍卫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激发全社会反腐力度的电影。

信函画心诚挚而措辞尖锐,为了不影响公司班子,万一受到省委指责,我准备个人承担一切责任,故此我落款用了个人名义。李长春书记在抗洪前线收到了我辗转交到他手上的信,已经是一个多星期后。

我7月12日的日记记录是:“晚上六点半,省委办公厅会务处刘处长来电,李长春书记对我的关于重视《生死抉择》上映的信已及时做了批复,并决定明晚全体常委和四套班子人员在省委二号楼看《生死抉择》。”

7月13日日日记记录:“原本通知今晚厅长和我司领导晚上参加观片,后来通知李书记和领导们先看,省厅和公司的领导不用去。晚11点办公厅打来电话,表示李长春同志十分赞赏影片,已作了重要批示,请我们放心,这两天就有文件下来。”

7月14日日日记记录:“省纪委办公厅以特急等级下发了《关于组织党员干部观看电影(生死抉择)的通知》,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携眷属一同观看受教育,通知规定全省党员干部都要观看,要主动与电影公司联系,要用党费作为党员教育专款支出。”

7月17日日日记记录:“到省纪委宣教室汇报并请示。省委宣传部终于签发推荐观看《生》片文件。”

7月18日日日记记录:“大雨。在省委礼堂举行《生》片广东首映式……”

同一天,《南方日报》头版头条醒目登出“一封来信引起省委书记高度重视,广东省委领导集体观看反腐影片”——文章将省委文件的内容基本刊出,讲述了我给李长春书记写信引发事件的来龙去脉。

7月,《生死抉择》在广东隆重上映,最终拿下800万元票房,震动全国。8月,全国开始了观看这部影片的热潮。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的,是每天站在电影院的台阶上迎接看片的观众。在观众中间我听到了诸如“看看这部影片,看看党还有没有希望!”的心声。

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人民和国家的希望!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了电影的价值。我和影片的主创人员、宣发人员也从此结下了二十多年的友谊,为人生事业途中的相遇,感到特别的快乐和幸福。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先说一下我观看《悬崖之上》(下称《悬》)的外部条件:五一假期在西南某三线城市某普通影城小厅(约50座),下午两点,观众大约有20人,我贡献其中4张。在当地,《悬》当日排片居第二位(43场),《你的婚礼》高居榜首(108场),《秘密访客》(40场)列第三。再下面依次是《扫黑·决战》(32场)、《追虎擒龙》(30场)、《猪猪侠大电影:恐龙日记》(14场)、《阳光劫匪》和《真·三国无双》(各13场)等。这个情势,与全国市场大体一致。

大盘情况是:十多部影片进入五一档,总票房和人次超过2019年同期毫无悬念。网易新闻索性用“史上最嚣张五一档”的标题来渲染之,而正文里则又不失专业理智地指出了一些问题,大量优质资源越来越集中于有限的大档期;排片、票房和质量不总能成正比;流量炒作和宣发型影评仍然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弊端助一臂之力,等等。我对这些基本判断都颇赞同,只补充两点:一是这些问题存在的时间其实已经不长;二是之所以如此,说明目前在创作方面,没有哪一部影片能通过开创新的叙事来突破只能依赖外国打法的僵局。从文艺史上看,上一阶段的艺术创作模式或生产套路长时间延续,带来艺术欣赏的疲沓和艺术消费的情性,这种局面如要打破,要么是某种美学新动向(包含社会心理内容的深度和艺术形式的开创等)的出现,要么是某种新技术应用的刺激。这两者都必须发生在艺术领域的核心地带,而不是边缘或外围,否则就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外卷”。

假如上述第二点可以成立(毕竟我对此并未做足够的统计与研究),则在此前提下来看《悬》,会感觉它是一部在工艺上——甚至在电影生产理念上——下了一番

历史无法自我完成书写,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过去的事件需要作用于现时的思想才得以复苏,通过与当下的连贯才获得了历史性。历史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它为当下的人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的过去”,这帮助我们树立起对自己和现实的理解。

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沉没的惨剧,百余年来经由各种媒介的叙述,灾难中所凸显的勇气与道德、责任与牺牲,已经成为了西方文化中现代“骑士精神”的象征。1998年《泰坦尼克号》进入国内市场,伴随着奇观化的巨轮从古老欧洲驶向“新大陆”,杰克和露丝生死相许的浪漫深情更让中国观众唏嘘不已,巨轮可以颠覆,但爱情和蕴含其中的价值却会常青。

不久前上映的《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是对长盛不衰的“泰坦尼克”历史叙事的挑战,影片以新的发现修正了对这场灾难的书写,作为历史纪录片,首先值得探讨的是,如何向观众确保修正的“真实”可信。

《六人》是一部叙事结构精妙的电影。它与常见的历史纪录片不一样的,既缺乏系统扎实的历史资料,也没有亲历者见证,观众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和行动者(施万克)同等的信息,船难中有8名中国人,6人逃生后没有留下任何

代号“乌特拉”

——观影片《悬崖之上》印象与杂感

文/左衡



功夫、而在“当下的电影应该是什么”、“当下的电影应该如何生产”等问题面前陷入迷惘的作品。

影片的开头处,用字幕交代了剧情的大背景。剧情本身也有历史真实事件和人物作为根据,我在查找这些史实根据时感觉到,历史的不可思议与惊心动魄,如用历史片的类型样式来拍摄,已经足以构成戏剧性、奇观效果(对大众而言)、美学意蕴(对艺术存在而言)和宏大意义(人类历史的反思与正向价值观的彰显)。当然,创作者出于自身的艺术理念,选择对历史原貌进行虚化处理,创造全新的艺术形象,这绝无问题。事实上,用字幕来完成对历史背景的交代,张艺谋导演在《英雄》一片中就已经这样做了,《十面埋伏》、《长城》、《影》也都如此,不妨看作张艺谋历史叙事的一个手法与策略:对海外观众有讲解的作用,对中国观众则还有代入文化记忆和激发审美期待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字幕又暗示给观众,剧情主体实际上出于虚构,因此影片并不需要对历史真实等承担苛刻的批评。

于是我们无法再用“第五代”电影活跃期的“寓言”、“后殖民”、“全球化”等话语来标注张艺谋近年来的作品。“新画面”末期的《金陵十三钗》、被誉为“返璞归真”的

《归来》、尝试中美合作的《长城》、又被誉为中国传统美学极致的《影》、再被誉为“写给电影情书”的《一秒种》,与最新的《悬》,这些作品并列在一起,会让人无从把握一位国际著名大导演的思路和招术。张艺谋本人在宣发时对这些影片非常感性的表达和非常正确的表态,也并不能帮助我们从中窥见他的电影观。

抛开探寻和叩问的心态,我倒产生了一些联想,如上面关于字幕的联想即是其一。另一个联想是关于影片里场景和道具细节的。在和亲友聊天时,我很不厚道地把张艺谋导演近年作品戏称为其大型实景演出的电影版,如“印象长城”、“印象荆州”,这次似乎也不例外,“印象哈尔滨”。关于场景,我的两个疑问是:为什么不能建构起一个大致完整的叙事空间?为什么除了与剧情相关的人物外,再没有人生活行动于场景中?第一个疑问让观众始终不知各角色身处何处、距离远近,场景之间并无有机联系,这反过来更凸显了场景造型在形式方面的极度追求;第二个疑问让或实有或虚构的城市都仿佛空城,更如同实景表演现场高度舞台化的布局,空间都只给表演者留出。

我关于细节的疑问更是百思

《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修正历史叙事的意义

文/虞晓

历史记录。这是被历史叙事的反常之处所激发出好奇心而开始的寻找,观众只能跟随行动者的视角,去历史的残片中可以发现彼此印证的蛛丝马迹,和他一起拼凑出历史的真相。缺乏一个“全知”的叙事引导者,历史的证据链久久难以闭合,悬疑感贯穿了影片的大半时段。

这是历史上背负骂名的6个人,他们的逃生经历被媒体宣传为“贪生怕死”、“伪装成女人的懦夫”。同样作为人,避难逃生是理所当然的本能,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导演罗飞阐述过纪录片面对历史的局限性,他承认总有些历史的真相是看不到的,你可以去猜,你可以再去研究,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确认,所以你能通过你自己的原则和想法去做出解释。

在无法找到历史证据的环节,施万克模拟当时的环境亲身试验,泡在冰水中找到相近的体感,再造一艘救生艇验证视觉的局限。这样看似笨拙的办法,是借助感同身受做出的辟谣,也揭示出了他们可以从船难中逃生,却被“社会性死亡”更精准和隐蔽的原因,西方媒体固有的偏见与刻意的扭曲,正所谓要塑造灾难中的英雄,首先就要打造被“污名化”的他者。

人道主义立场是影片的价值,《六人》不是对于历史冷静的推理断案,而是朝向历史“寻人”的

故事。罗飞想要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经历的事情,他们或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的生活,或客死他乡、不知所终,寻找的过程屡屡中断,6个人不尽相同的面目模糊,逐渐清晰的是海外华工遭受的“非人”待遇。

这是影片故事的时代背景,成为了全片最让人激愤的泪点,也是罗飞对历史无奈的“解释”,当他把摄影机对准历史的模糊之处,呈现却是在泰坦尼克沉没的年代,西方列强排华政策下中国人的共同命运。

当然,《六人》并不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尽管不可避免触及了中国观众对近代以来民族屈辱的“共同记忆”,但出发寻找的目的,是让今天的观众去理解历史上的人。幸运的是,方文山的身世逐渐清晰,它让故事必不可少的角色塑造得以落实,也让影片在涉及庞大的历史议题时,始终没有脱离日常化的情感带入。

方文山从历史中的显形,是借助儿子方国民的视点完成,我们认识这个人物的过程,也叠化着儿子对父亲的重新认识。在方国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有着代沟冲突,沉默寡言,总是不合时宜西装打扮的“污名化”的他者。人道主义立场是影片的价值,《六人》不是对于历史冷静的推理断案,而是朝向历史“寻人”的

不得其解。当年看《归来》的时候,IMAX上看到剧中年代里的公文信件,明显是电子排版,就觉得很不舒服。《悬》里也如此,剧中的密码书、影院影讯预报都一望而知并非当年印刷或手工的样子。最难以置信的是,墙上贴了《中国海的怒潮》海报,这部1933年由岳枫执导、阳翰笙编剧的影片,是不折不扣的反日进步电影,它是绝无可能出现在日治下伪满境内的。

在我看来,这些疑问虽小,确实关联到电影的本体论和电影作者的状态。相比之下,谍战剧情是否严谨,剧作结构和节奏是否出于“剧本杀”式的新玩法,演员表演是否出彩,整体氛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这些问题反倒容易得出结论。进而,对它在这个档期的表现,也应该给予再认识。这意味着,要综合票房和口碑等各个方面的结果,形成更全面、距离感更适宜的系统评价。

张艺谋导演近年的作品不再像“寓言”,而更像“迷宫”。身处其中的观众(尤其是影评者)会走入相当有看头、够刺激的路径,但随后很可能发现这条路径并不通向出口。又一部作品上映,观众再次回到迷宫深处的原点,再次开始探索。对于一部影片只看一遍、观影目的为娱乐刺激的普通观众,这个过程其实并不纠结。影评人如果陷入思考和纠结,那是他们应得的烦恼,缪斯是否赞赏,上帝是否发笑,都该留给时间去检验。

然而,我们毕竟关心张艺谋导演,关心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格局这个更大的迷宫,而且,我们对中国电影未来的出路怀抱有“乌特拉”——那带有陌生感的“希望”。我对《悬》的疑问,也只有放置在我的“史上最嚣张的五一档”、同样还可以说是史上最嚣张的中国电影年份等背景下,才显得更有价值和必要。

意,对故土亲情的眷恋,和海外求生的顽强。最耐人寻味的细节应该算衬衫领带,和泰坦尼克一起沉入大海的,是他对自我新身份的向往,犹如他在沉默中始终没能实现的命运。

方国民最终通过《泰坦尼克号》中的镜头完成了对父亲的认同,他当年在冰冷海水中的抗争和所获得的救助,救人者和自救者都是英雄,共同成为了自己生命和身份的起点。

方国民对父亲救命恩人一家登门致谢的举动,和摆放在高处隔着泰坦尼克模型并置的照片,承担了罗飞隐藏在历史寻人中的包容的价值表达。历史应当被正视,污名应当被清洗,对人类社会而言,不同的族群之间应该形成社会意义上的“公众”,哲学家杜威把它定义为不仅仅是个体的相加,而是一群为了公共利益能够集体行动的人。

因此,《六人》不是对泰坦尼克历史叙事的颠覆,而是寻找真实实现对历史叙事的修正。《六人》告诉我们历史上西方强权曾经的傲慢与偏见,当“中国人”从历史事件的旁观者变成亲历者,对过去的重新审视也影响着对当下现实的理解。遗憾的是,人类文明的巨轮并未驶离让泰坦尼克沉没的那片海域,所以影片结尾的提示显得尤为重要: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就多一份力量!

六,担当

2000年,这一年必须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事情是一部反腐影片《生死抉择》的决然上映,而且成为了在电影产业全面进入市场状态之前,票房过亿的电影,在当时极其难得。

影片根据山西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由上影厂编剧贺子壮、宋继高改编,副厂长于本正执导,王庆祥等艺术家主演。我与张平在十五年后终于见面,为十五年的“神交”划上圆满句号。

2000年中国电影还在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中跋涉前行。严肃正气、振聋发聩的《生死抉择》还没能遇上《人民的名义》上映的时代环境。影片所揭露的腐败现象尽管触目惊心,尤其是前所未有的直指官场的腐败窝案,并且是以裙带关系为核心的塌方式腐败。

影片之所以让人们热血沸腾,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敢于向自己开炮的反腐英雄李高成市长,代表了人民群众长久压抑的心声。

上海电影制片厂召集全国的电影公司负责人到上海看片,之后我拎了一个拷贝回到广东。此时全国发行的形势不太妙,除了上海之外,也就四川做了40万元票房,主旋律依旧举步维艰。

6月30日晚,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海珠区的党员电影之夜,庆祝“七一”。我本能地问:“他们上映什么影片?”回答是一部美国大片《龙旋风》。我二话不说,带上公司的员工黄臻平 and 一位广告公司的朋友何志凯,拎上《生死抉择》唯一一个拷贝,开上自己的红色捷达,直奔市二宫。

我们到达的时候离放映只有五分钟了,海珠区的有关党员和领导干部已经早早入座。我对市二宫主任说,我想给大家换一部影片。主任非常惊讶,他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换什么片?一部国产片。主任几乎晕倒:“赵总,这个可使不得!”主任说:“现在请‘大神们’来官里看一场电影多不容易,如果不是美国大片,这个党员之夜一定搞不成!”当年的逻辑,今天看多么难以思议。

“请给我两分钟,主任同志,您别着急。”“赵总,你要干什么?”我说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他犹豫、同意的瞬间,我拿了一个麦克风走进了放映大厅。这是广州炎热的6月底,放映大厅这晚的空调掘闻不幸坏了,正待维修,前后六把大风扇静静地转着。

人们焦急地等候电影开场。我跳上前台,先来了一句:“亲爱的党员同志们,”全场的目光霎时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平缓地说:“明天是我们伟大的党诞辰纪念日,很高兴今晚我们欢聚一堂。”这一刹那下一片静寂。